

贫困治理视野下文化扶贫建设的多源流梳理

何梦焕¹ 金振广²

1 西安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 长安大学运输工程学院

DOI:

[摘要] 本文系统梳理了我国文化扶贫建设的理论形成与发展,分析了文化扶贫建设的理论源流是马克思反贫困学说,阐发了文化扶贫建设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养分,探讨了党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关于文化扶贫建设相关理论,为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神力量。

[关键词] 贫困治理; 文化扶贫建设; 乡村振兴; 内生动力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Multi-sources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verty governance

Menghuan He¹ Zhenguang Jin²

1 School of Marxism, Xi'an Medical University 2 Colleg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theoretical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construction,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construction is Marx's anti-poverty theory, expounds that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construction absorbs the nutrients of the well-off society and Datong society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discusse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leading collectives of the past dynasties provide spiritual strength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ontrol of poverty;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construc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Endogenous power

文化扶贫建设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中吸取营养,批判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涵的解决贫困、构建理想社会的丰富内涵,深刻理解中国近代社会久经磨难、民生凋敝,中华灿烂思想文化受到猛烈破坏,以及进步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推翻三座大山、完成两大任务而付出努力。在此基础上,党和国家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出历代领导集体关于文化扶贫领域的重要思想,从而表征着文化扶贫建设的重大意义,更是当代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伟大实践。

1 文化扶贫建设的理论源流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是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第一次提出了有关文化的理论思想。“生产力有两种,一是物质生产力,二是精神生产力。”^[1]贫困产生的根源除了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有关之外,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揭露资产阶级虚伪平面的民主、财团政治下财富分配不均、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大肆剥削与压迫的事实,从而凸显出的劳动者贫困的真实原因。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工人的绝对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

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2]马克思认为工人的绝对贫困是资本家掠夺工人劳动,剥削与压迫工人,导致工人劳动创造的所有为资本家所支配,其本身并没有分配财富的权利,导致工人付出劳动反而越来越穷的局面。资本家由于自身掌握剩余价值越来越多,其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贫困的过程,“不管工人的报酬的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伴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益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一切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因此,要想摆脱贫穷,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观,以人为中心,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不断地通过自身的改造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使人获得自由、全面的解放,从而突显出脱离贫困的最高境界。

2 文化扶贫建设的历史源流

新时代有着新矛盾，解决新矛盾必须始终坚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映照当代社会，要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民族梦，强调新时代文化扶贫建设是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锻造出来的一种本就存在的先天良好优势，从而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文化扶贫建设的有着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天下为公”是构建“大同”社会的理论基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与睦。”^[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勾勒描绘出今日“小康”社会的雏形和样本，孟子兴民利民除民害，主张重视对民众的教育，从根本上解决民困问题。“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民众生活有了保证，就必须考虑对民众进行教育，否则人就会如禽兽不知礼仪，缺乏道德修养。由此可见，早在这个时候就有了“文化扶贫”的雏形，只解决温饱问题不是根本目的，只有民众素养提升，社会才能算得上真正进步。墨子一生都为扶贫济困而奔忙，他的理想社会思想深刻影响着我们。“百姓暖衣饱食，便民无忧”是墨子心中构想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一如原始社会公社，也与尧舜汤武帝典型相类似。为挽救天下动荡混乱的颓势，墨子开方治病，提出“兼相爱、别相恶、交相利”“义利统一”等解决“不相爱、自利”。打破“亲亲有术，尊贤有等”，以努力和发挥创造精神克服“宿命论”“世袭制”的弊端。

1840年之后，中国社会遍体鳞伤，人民生活困苦，中国五千年辉煌的文化被彻底摧毁，面对着一系列深刻的问题，现代的仁人志士们大力学习西方先进制度、文化、技术，为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积极进取。“求根本救亡”，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中国人民摆脱愚昧无知、封建思想的桎梏，以陈独秀创立《新青年》（《新青年》）为开端，早期提倡“民主”、“科学”，对孔学进行了抨击，使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发生了动摇，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促进了救亡图存。最后，这一序曲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学生、工人、商人纷纷罢工，以一种史无前例的姿态站在全国救亡运动的前沿，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集合广大革命力量，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充分的准备。

3 文化扶贫建设的政治源流

党的历代领导集体扶贫领域的重要思想经历了“两个文明、两手抓”到“三个文明”再到“五位一体”。这标志着当代中国全方位、立体化地推进文化扶贫工作，从而体现了文化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的重要影响。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长期遭受“三座大山”剥削和压迫，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片狼藉不堪的局面，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应对困难，主动解决问题，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旧有的教育事业十分

落后，文盲众多，基础教育薄弱。在城市，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20%，工人、贫民子弟一般读不起书；在乡村，还有相当多的旧式教育，农民子弟大多数五千入学”^[5]党和政府大力倡导改革旧有教育文化事业，鼓励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新社会生产事业，从而使人力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建国初期，我国教育水平低下，人口文化素质差，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全国80%以上人口是文盲。”^[6]由此通过扫盲这项具有文化扶贫性质的行动，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专门文化队伍的日益壮大必将对社会繁荣昌盛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1952年与1949年相比，农村在校小学生数增加111.8%，中学生增加186.2%。”^[7]除此之外，教育部针对高等学校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我国高等学校布局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有所改变。党和国家从文学艺术着手，以此推动文化建设，“借以配合热门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8]这个时期，话剧《龙须沟》、歌剧《长征》、长篇小说《铜墙铁壁》、《歌唱祖国》等文艺精品不断涌现，增强了人们的思想觉悟，增强了人们的理想信念，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极大地满足了人民文化需求，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整理和摒弃戏曲文化中的糟粕、消极成分，整合资源，组建三联书店，此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在传播正能量、引领社会风尚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了历史性的转折，开始了我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会议还阐明了要重视科学和教育。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央文艺工作的口号：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掌握文艺发展和繁荣的基本规律。此时，大量拨乱反正的作品陆续出版问世。经过长期的努力，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走上了正轨，各个领域都有了很大的成就。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取得长足进步。“1978年，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5.5%；1982年，文盲率降至22.8%。”^[9]在经济调整取得成绩的同时，党中央坚持贯彻新的“八字”政策，把长期的生活欠帐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凝聚人心，把人民团结起来，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做好。所以，我国实行对内改革，首先是把农村作为突破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创造了条件。“最早实行“双包”责任制的凤阳县，1980年粮食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79年又增长14.2%，许多生产队和农户实现了‘一季翻身’‘一年翻身’。”^[10]“六五”规划目标的实现，使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问题得到了解决，粮食和棉花产量大幅度增加，为解决粮食和棉花生产创造了条件。“五讲四美”、“三热爱”是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提倡开展的第一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的一项内容，也是邓小平同志提倡把文化和科技结合起来的“两个文明”，并把它融入到国家的建设之中，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在反贫困方面，江泽民同志指出：“努力解决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11] 1993年12月,设立“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专责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工作。次年年初,发起了“万村书库”项目,在1000个乡镇建成了乡村图书馆。后半年,“电视扶贫”正式启动,在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万户家庭架设了电视天线,使每个家庭都能看到五彩缤纷的电视节目。另外,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明确指出,从1994年起,要在七年内投入三倍于前七年的扶贫资金,“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以此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扶贫制度,同时也证明了由救济扶贫向开发扶贫的重大转变。“在这7年间,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累计修建基本农田6012万亩,新增公路32万公里,架设输变电线36万公里,解决了5986万人的饮水困难问题,通电、通路、通邮、通电话的行政村分别达95.5%、89%、69%和67.7%。”[12] 中央宣传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五个一工程”精神文明奖的评选,起到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重要作用。1995年4月,“送戏下乡”计划正式启动,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也能欣赏到精彩的话剧。“三下乡”是我国政府于1996年12月进行的一项惠民项目。“2000年底,全国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2.5%和93.7%,比1995年分别提高了13.7%和9.2%。”[13] “九五”规划主要任务或已超额完成,居民的衣食住行消费水平明显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2000年以后,我国更加注重文化扶贫,使文化扶贫由实践探索走向全面发展。《2001-2010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的出台,明确了“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相结合的目标,强调了“脱贫攻坚”对“小康”的宏伟目标。

“拓宽扶贫开发渠道,增强扶贫开发合力”[14]是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贫困治理思想要义。“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15] 胡锦涛同志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贫困的根本问题看成是解决人的问题,认为扶贫既要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又要注重思想和精神上的扶贫。新农村建设项目的实施,是我国扶贫工作的又一项重大举措,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决心。先进文化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结合,有利于扶贫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在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贫穷问题上,中央领导克服困难,建设青藏铁路,为青海和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自2004年以来,每年都下发“中央一号文件”,这对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农民持续增收都是一件好事。中国扶贫发展基金会于2008年12月发起了“文化扶贫计划”,目的是为贫困地区提供信息、教育和文化支持,并设立中国扶贫宣传教育委员会。党和国家加大了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在体制上、财政上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比如:如调整文化事业费结构,广播电视村村通,解决了看书难、看电视难、看电影难、收听广播难的问题。九年义务教育,确保了所有义务教育适龄儿童都能“不花钱,有学上”。全面规划部署未来10年我国教育改革,使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一代成为新的劳动力主体,为我国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不断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科学扶贫、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工作方面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扶贫工作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推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6] 国家领导人指出了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存在的短板之一。但脱贫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文化扶贫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对我们党的建设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扶贫工作既要使贫困群众物质生活得到充分的满足,更要使思想上、精神上不能落后,这就是贫困的根源。“解开贫困枷锁,彰显发展活力,归根到底靠的是内生动力。要使地方稳定地走上致富之路,还需要建树‘源头治贫’的理念。”[17] 要根除精神领域的贫穷落后,文化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助推器。“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18] 文化扶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激发贫困群众的内在动力,防止愚昧无知、迷信的行为和现象。“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从执政至今的重大任务。国家领导人这次把“消除贫困”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结合起来,对扶贫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扶贫工作的重视。

新时代有着新矛盾,解决新矛盾必须始终坚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映射当今社会,就是表现为:要精准扶贫,脱贫致富,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更好的实现和谐社会,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民族梦和构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凸显新时代文化扶贫建设不仅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文化自信,更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内生动力。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43-744.
- [4] 《礼记·礼运》,引自侯光复主编,艾钟、郭文举注释《儒家道家经典全释—礼记》大连出版社,1998:180.
-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50.
- [6] 国家统计局.沧桑巨变七十载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01_1673407.html.
-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10.
- [8] 《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1949年7月1日,《毛泽东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82,83.
- [9] 国家统计局.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01_1673407.html.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690.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816.

[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843.

[13]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N].绵阳日报,2010-01-20(002).

[14]李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新疆库车县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J].实事求是,2009,(05):60-62.

[15]胡锦涛.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R].人民日报,2005-05-29.

[16]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6.

[17]闫群.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N].莱芜日报,2008-08-20(A03).

[18]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7-18、24.

作者简介：

何梦焕,女,硕士,西安医学院。